



抗日时期的村公人——武万和

□程晓瑾

武万和(1901—1986),人称“大老武”,文水县永乐村人,幼年未入学,1921年至1927年曾在祁县、绥德等地当木工。1927年回乡务农。1938年当本村村公所公人,和我抗日政府王智等同志取得密切联系,在抗日政府领导下,同本村二有光、王老三(外号鼻涕三)等一道,积极进行抗日斗争,为抗日政府购置物资,送递情报,配合政府除奸。

1939年秋,我抗日政府向里村(原属文水,现属祁县)三十多村配要一部分布匹。但里村村长密报驻祁县日军,致使日军出发进行“扫荡”。因此,我抗日政府决定处决这个汉奸,责成老武等4人执行这一任务。他们于前一天晚上深入里村,将该村长抓去到处处决,张贴了文水县抗日政府布告。处决这个汉奸村长的第二天,其他的三十多村将配要的布匹如数送到指定地点。1940年初冬的一天,有3个日伪便衣去到石水镇公所,对村干部进行毒打,逼着要钱要物还要“大姑娘”,村里派人将这一情况汇报了王智同志,王派武万和、二有光、王老三等四五个公人赶到石水镇村公所,将三个鬼子消灭掉。

由于武万和同志在当村公人期间做了大量的抗日工作,其名声响亮了,城内日伪军四处出动抓捕他。一次,一个汉奸带上日军点了他的房子,后来老武捉住了这个汉奸,并把他处理了。自此以后,他在村上无法生存,便于1941年上山去到三道川,由抗日政府区长文政同志介绍,参加文水县抗日政府,搞事务及通讯工作,直至1948年。

1948年7月,文水最后一次解放后,老武同志在县委机关搞事务工作,除负责县委、县政府的生产工作(开始跟大车跑运输,后来在南街开棚坊)外,县里召开大会总少不了这位“老事务”。他虽然无文化,但算数精通,口算精确,因此每次大会既能使大会人员吃好,又无浪费现象。

五十年代初,武万和同志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,觉得没文化做不好工作,所以他参加了县里举办的“速成扫盲班”,继而参加文补校初级班学习,后来他也能看懂一些便信便条了。

多年来的革命工作,使他对党有了认识,1955年他写了入党申请,经二年多的培养,1957年2月加入了党组织。1958年1月,他担任了文水县机关招待所第一任所长。在任期间,除全面负责全所工作外,一有余暇,就帮助炊事员干活,对于有疾病或有困难的客人,尽力帮助解决。县里召开什么大会小会,他会同以往一样,尽力帮助搞好后勤工作。1965年9月,武万和同志因老退休,1982年改为离休后,患有高血压,后瘫痪。他在病期间,见到原县委机关的干部时,还念念不忘地说,那些房屋是公家买的。1986年12月11日病故,享年85岁。

晋绥一专署下辖兴县、神府、岚县3个县。当时专署、县府合署办公,由于战争艰苦频繁,政府机关就必须精干,人员少效率要高。全专署设民、财、教、建、司5个科,1个专职秘书,1个事务室,1个机要交通站,连同专员、县长、通信员、炊事员,满打满算总共40余人。财政科人最多也只有六、七人。民政、教育、建设、司法科备2至3人,一人还得常年抽去下乡。工作不分昼夜,就是熄灯休息了有人打门,照样起来办公不误。1944年夏日,全专署闹伤寒病,除三、四个人没有病例外连司法科唯一的丁山同志也躺倒了。司法科业务临时由民政科代办,其实民政科也只有3个人,还常抽1人下乡。交通站除站长外还有6、7个交通员,经常身背手榴弹和手枪把延安送来的重要文件转送各地,从无丢失。有时交通员病了,张立中站长亲自顶班。

地方机关工作和部队后方机关工作并无两样。尤其在日寇频繁的扫荡期间,机关工作人员均须分散,深入区村协助工作,发动群众坚壁清野,组织民兵配合部队打游击,除少数老年人和病残一般都不准过黄河西岸躲避。有一次反扫荡,李家湾听到枪响,瞭望哨一再催我们快走,我们还往被敌烧毁的旧县财政局二层楼上装藏挑选的茴子白。等到我们从紫沟往红花梁上转移时敌人已进了西关。我分配到木崖头行政村,当晚宿白家沟,第二天天亮到木崖头,区村干部早已在那里等候。张伟民(县青联干部、华侨、广东人)、张坎(一完小教师、河北人)和我正准备过河(指山川岚漪河),对面一个女同志高喊,“是自己人吗?”我听出是五区妇联范水英的声音,忙回答“是县里的老张。”范说:“不要动,河沟已埋下地雷,我下去接你们”。当夜我们分开来到南梁北梁村一带,那里收获的庄稼还未入仓,我们发动群众突击枪打就地坚壁。

过三四天,敌人从庙子井村梁上过来,我和尹高栓村长误入敌包围圈,跳到一个墙内躲藏,连日本军旗都看得见了。下午我们回到南梁村,抗大七分校几位同志早已把小米焖山药蛋干饭吃了,给我俩留在锅里。此后我就跟随他们行动。六个人只带一支枪两发子弹,在三十三梁村沟里被敌骑兵追赶甚急。抗大一位姓李的同志说“大家转移,我为国尽忠”,打在敌人马腿上,第二颗子弹塌火了,敌骑兵扭头往回就跑。大家在山头上开心地说笑着。埋在木崖沟里的地雷由于发火管失灵,敌人踏着了但没有爆炸。

田家会、甄家庄战斗中,专署同志大都随特务团27团行动,昼宿夜行,捕捉战机,公文印鉴随身携带,保证粮草担架及时支援。1943年反扫荡总结,五区高家崖村长高映涛将敌机关枪误看作是压面条用的“河捞床”,身背印章找印章,导致有人慌乱中丢失步枪1支,子弹10发,传为笑料。

平时我们工作中最难办的是遇到灾年征粮困难,残废军人安排不好,军用物资转运困难。对此,专署做了专门调查,并采取多种办法解决。我们还帮助残废军人生产自救,以克服和渡过困难。晋绥边区自己制造的“燕燕”肥皂就是一个退伍军人在西关用两口铁锅自己配料制成的,这种肥皂还招待过前来晋绥参观的中外记者参观团。闻名全县以及岚岚一带的木质烟袋锅也是出自一个残废军人的手艺。工卫旅司号员每次来民政科就说:“马西夺大炮”是他吹的冲锋号。(八分区一次对日战斗),摆

晋绥一专署 工作生活点滴

□张维勤

老资格。李尚信科长经常告诫我们,要耐心,同情他们,不能发火。

一专署还代晋绥军区司令部、晋绥行署颁发部分残废退伍证。一定时期向军区和行署民政处核对存档。文革后期一天我去刘献珪家闲聊,正好碰到原陕甘宁边区警一旅的一位退伍医生常丛林(当时太化医院院长)拿着沈越、刘献珪签章的回冀中行署的介绍信找刘核对。刘说:“手章没有错,谁写的介绍信看不出来。为什么写民国不写公元。”我一看是杨文联的手笔,介绍信无误,但是否拾得别人的,不好肯定。后经组织调查,证实是常的介绍。原来当年常回冀中,因战争辗转两年回不去。1946年,常在代县街上可巧碰上他们旅的伙食管理员,告诉他代县中学院内堆满伤员,你还不去做手术回什么家。就这样常南北辗转,来到太化,他把那张麻纸介绍信贴在白洋布上,视若珍宝。

1988年,我回兴县探亲,刚下汽车碰到蔡家崖一农民问我是否民政科工作过,姓张,说他的残废证就是一个姓张的还是一个姓杨的青年人办的,后来丢失了,县里至今不承认,只给了临时领款的单子,还翻开衣服叫我看他的伤口,说他是特务团一营的。离休后我翻阅过山西省民政厅编印的烈士名录,兴县籍只3人,是经我亲手办的,其实岂止此数。离石官庄垣对日战斗中,兴县籍战士牺牲40多人,当时除按规定抚恤还造册存放神府县一个村,日本投降后又转移到边区拥军爸爸任万生家里保存。至于太原绥包战役中牺牲的就更多了。1946年,一分区武委会干部胡建科同志带领民兵北上绥远支前牺牲,至今长眠在大青山下。

兴县每年两次动员新兵,每次200名或400名,补充120师或其他部队,120师特务团后来人称兴县子弟兵。1943年调来的27团,到1946年,四分之一的战士是在兴县补充的。晋绥军区警备营700人中兴县籍战士400人。这些同志现在多已去世,除少数逃走外大都牺牲。他们的英名未能录入烈士名册。

一专署机关生活艰苦紧张但颇有规律和节奏。清早七时半起床,随警卫连跑步。跑完步回来学习两小时。学习内容包括实事、政策、政治常识等。对不识字的同志,每晚由各科室抽人教认生字。沈越专员到任后,还要求将每天报纸分类剪贴成册。《晋绥日报》杨效农同志来看爱人田允中,支部请他出若干时事政策题,举行测验,以推动学习。每逢过年过节,我们还自编自演文艺节目,组织秧歌队活动等。1945秋排了一场描写机关大搞生产的戏,杨文联扮棉花姑娘,刘克增扮个长山药,虽然水平不高,西关演出时还吸引来不少观众。

为节省开支,机关提倡无事不点灯,破纸要集中,料废重复生。财政科两盏灯,每晚发两钱油。其余科室只准点一盏灯,每晚发3钱油。冬天到来,烤火炭一室10斤,院内炭堆如山,但谁也不敢去拿。白天不生火,晚饭后才生火取暖。这个传统一直到全国解放后不变。晋西北吃黑豆,在各根据地是出名的。那时粮食定量,每人每日小米斤半,盐3钱,油3钱,菜1斤,实际有时停发,有时发得很少,全靠自力更生。1943年到1947年,小米减到15两,以后又恢复到斤半,还得节约2两备荒。每日两千

一稀,早晚多稀饭炒面,偶然改善伙食,小米干饭就算不错了,有的好吃的留在过年过节聚餐。1944年后,搞生产有点家底,才改成早上莜面、拨烂子和稀饭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事务长康连枝拿上伙食账找李振东会计核算,看有没有亏损。李算来算去还多出2斤猪肉的钱,这天中午大家搓莜面鱼和山药蛋、猪肉炒到一起,来了个莜面烙猪肉,大家像过年一样美吃一顿。

1944年到1948年,机关一直利用早午晚时间纺线种地。抽烟的张龙怀、丁山、李振东、张立中、杨友联还种了一小块烟草。白刃专员习惯晌午去剪西红柿的油条,叫我和孙平善(警卫员)去陪他。为了不和群众争水,我们利用晚间去浇水。有一次孙启明科长和我值班,要清早四时去田里打水浇地,多次叫不醒我,最后索性甩衣服给我穿起从炕上拖下来,才把我惊醒。

每年春秋换季时节,天天打问军区后勤部去晋察冀驮布的牲口回来没有,老等发布换季。那时从来不发衬衣毛巾,更不说肥皂了。夏天中午到河里,先洗衣服后洗澡,用灰菜当肥皂。冬天半身穿棉衣,后来两年发一套棉衣,第二年发四尺补丁布。对如此缺衣少粮的物质待遇,大家都无怨言还互相谦让。孙启明、刘壮、马安国、张龙怀等同志一再将发给自己的衣服和布让外地同志用。油印员李忠元给救济30斤小米就是不要。杨文联同志当时已是当爸爸的人了,全家只能领到40多斤粮煮稀饭吃。1946年,杨到绥蒙前线慰问,临时托我把口粮月底送去。有天早上我送去粮时,他家正吃早饭,一小盆稀饭煮几颗山药蛋,孩子们捞了山药蛋,他的爱人只喝稀汤,还得帮人洗衣服做鞋底。

专署本身没有医疗设备,有病找中医看。重病送军区卫生部后方医院看。孙启明科长的爱人得鼓症(腹水),无钱医治,命在旦夕,可巧军区卫生部祁开仁部长在兴县召开中西医结合座谈会,将她作典型,中西医结合治疗。祁部长给抽腹水,张尊五老先生给吃中药紧跟,不久病愈。1943年到1944年,120师几位年老体弱的军医退伍,我们安排东关一个小庙内开办社会福利性医疗所,为群众看病,后又请出张尊五老中医,发展成为兴县民众医院,从此小病再不必找私人医生和120师卫生部了。

尽管物质生活那么困难,但人们精神饱满乐观,加上领导同志带头,吃苦在先,不特殊化,上下一致,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白刃同志按规定吃中灶,但每次炒点白菜、豆腐、鸡蛋,总是分给病号和胃口不好的同志享受。警卫员孙平善把白刃的被子丢到河里,自找块砖头一枕,席地而睡。小孙个子小过河有困难,白叫他骑马过河,他却自己徒步过河。

一专署的同志除1948年组建榆林地委去了一部分,其余都随军赴全国各地,好多人已谢世。回忆往事,他们清正廉洁、一心为公、不谋私利、刻苦奋进的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,永远是指导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保证。(1992年4月13日 于太原)